



种豆得瓜：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与汉字检字法改革

□陈勇明* 李禹阶

摘要 民国时期，因旧有的汉字检字法难以满足图书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一些图书馆学人便致力于检字新法的创制和理论探讨，并很快成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积极参与学术争鸣，探讨检字法的评判标准，正名专业术语，批评抄袭之风，将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交流平台，将图书馆作为检字法实践的场所，从而引领着学术潮流。这些图书馆学人不仅为汉字检字法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更是种豆得瓜，解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拓展了对汉字构成单元和结构的认知，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和简化，其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图书馆业与检字法本身。图书馆学人这种勇于打破学术畛域，不囿于自身行业的学术取向，至今犹具借鉴价值，但任意拆分汉字结构、盲目创造新字的教训亦有警戒意义。

关键词 图书馆学人 检字法 汉字规范化 汉字简化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4.016

欧美国家的文字由有限的字母组成，图书馆的各类排检按照字母的次序，自可分门别居，不相杂陈。而汉字复杂的形体结构和声韵系统使其排检无序，由此影响到“图书馆排检目录和编制索引”，遂成为“关系到整个学术界的大问题”^[1]。汉字检字法本属汉语言文字学的范畴，民国时期，一大批图书馆学人^①致力于汉字检字新法的发明和理论探讨，很快掀起了一股学术潮流，今学界或谓之“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2]。这场检字法改革运动不仅为图书馆业提供了多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检字方法，而且为邮电、商务等其他行业提供了比较便捷的检索工具，更解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加深了人们对汉字结构的认知，推动了汉字笔画、笔顺、形体等方面的统一，进而促进汉字的规范化和简化，其影响可谓划时代。

在有关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的已有研究中，学者或从总体上勾勒其历史概况^[3]，或从国语运动的视角展开论述^[2]，或单就检字法某一类别进行探

讨^[4]，或研究主题本非检字法而略微论及^[5]。从图书馆学人及图书馆学的视角研究汉字检字法者亦不乏时贤。范凡从图书编目、索引以及图书馆学人对当时落后的中国学术的认知等角度，探讨了图书馆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的原因；又着重论述了杜定友、王云五在创制检字新法和万国鼎在检字法理论方面的贡献^[1]。王子舟深入论证了杜定友在检字法上的卓越贡献，将研究的视野延伸至20世纪后期，并将杜定友的“字根”学说与汉字的信息处理等相结合，条分缕析，发人深省^[6]。张望自则从研究历程的角度将杜定友在检字法上的创制分为启蒙、中期和后期，探究其在检字法上的研究路向^[7]。吴稼年从学术商榷的视角来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字法上的争鸣问题，重点论述了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和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所引发的学界“商榷”，进而论及与之相关的书次号顺序、目录功能等方面的争鸣^[8]。

综合已有成果，学界或聚焦于王云五、杜定友等

* 通讯作者：陈勇明，ORCID:0000-0003-1587-5646，邮箱：354098458@qq.com。

① 现代学者如陈燕将民国时期创制汉字检字法的学者归为这样几类：留学归来的学者或大学教授（如林语堂、张凤等）、官僚政客（如陈立夫、何公敢等）、图书馆学人（如杜定友、沈祖荣等）、出版界高层（如王云五等）。显然，这样的划分还不够严密，如王云五的确是出版家，但他还是东方图书馆的馆长，后来又成为官僚，其在图书馆学方面造诣颇深。作者认为：不管专业出身的背景，只要在图书馆学方面有所建树或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都可谓之“图书馆学人”或“图书馆人”。参见：陈燕，国语运动与汉字检字法改革[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6）：18-23。



个人的检字法贡献，或侧重于检字法的某一方面展开论述，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参与汉字检字法的研究尚乏整体观照。尤未见论者从图书馆业的视角审视检字法的起因，以及探讨这批图书馆学人因创检字新法而在汉语史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尚有较大的学术空间。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从整体的视角纵观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参与汉字检字法改革，确有别样的学术景象。此文拟以民国时期常见的报纸、杂志中的相关记载为主要史料，将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与汉语言文字学的有关理论相结合，通过实证的归纳和理论性的阐释，以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1 图书馆学人掀起了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潮流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定 540 部排检汉字，依据“六书”理论，兼顾形义关系，遂为中国传统检字法主流。至唐代诗赋取士，汉字历经篆、隶、草、楷等形，字书不宜再据《说文》故例，于是韵书大兴，依韵排检。明代梅膺祚又仿《说文》旧例，弃韵从形，依据楷书字体，立 214 部，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笔画多寡定先后。《康熙字典》沿袭梅氏之法，沿用两百余年。20 世纪初，传统的检字旧法不敷时用，开始动摇。当时学人道：“其法艰难，性不固定，新文化则着重效率，一也。其法迂缓，费时费力，新时代则着重经济，二也。其法用于字书，专索单字，尚嫌困难，新时代所着重之参考物如图书馆目录、电话簿、人名录、杂志索引、档卷编排等，多系词句，尤不便应用，三也。而我国参考物因旧有排检困难，有如暗礁，故极形缺乏，今时知参考物关乎文化之进展，学术之进步，教育之普及，故渴望各项参考物增加，同时亦渴望一极简便之方法，四也^[9]。”旧法的动摇即意味着新法的萌芽，其缘由除上述 4 端外，尚有其他因素：政治方面，旧时学人不敢对皇帝钦定的字典说三道四，而辛亥鼎革后，学界发出了“打倒《康熙字典》”的呼声^[10]；思想方面，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民主”和“科学”之风摧毁了落后的知识体系；社会方面，国语改革运动催生了“检字法改革运动”等等^[2]。

但在众多因素中，图书馆学人为解决图书馆各类检索问题，进而掀起汉字检字法改革潮流，乃为根本。当时图书馆学人即持此说，目前学界却尚未论及。检字法改革运动的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两者并行绝非偶然。被誉为开启近代汉字检字法改革潮流的林语堂于 1927 年云：汉字检字法已成社会公共问题，研究者的动机不外乎两种，“一为专治字典编纂排列问题，一为专为图书索引之便利问题”^[11]。图书馆学人万国鼎 1929 年亦云：“汉字排检法之善否，不独与字典有密切关系，他若辞典、百科全书、图书目录、索引、序列，以及人名录、商名录、电话簿、电报码之类，亦无不利赖之^[12]。”“汉字形体复杂，笔画繁多，难识难写，排检印刷打字等，亦无一不难。其关系固不仅限于图书馆，然与图书馆之关系至巨”，“排检不便，则书目索引等无以神其用”^[13]。字典的检索是单字的检索，而图书书目、人名、内容的检索，则是词组或句子的检索，难度更大。加之西方书籍的大量传入，知识种类的不断增多，旧有汉字排检法难以适应图书馆业蓬勃发展需要，于是不少图书馆学人便投身于新法创制。万国鼎发明“母笔检字法”时云：“有书目索引等之编制，病旧法之迂缓纷杂，渴望新制之成，遂发宏愿，肆力治之^[14]。”1931 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馆员方承谟也写道：“检字法在图书馆事务范围内，亦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至少排列目录片不能不用他(它)。在以字母为文字单位的国家，对此原不生什么问题；可是在我国复杂的文字之下，这问题就不易解决了，原有的部首既检查不易，于是就产生了各种检字法^[15]。”

1933 年，图书馆学家蒋一前指出图书馆学人因图书馆业发展的需要掀起汉字检字法改革潮流，还指明其过程：“图书事业，朝夕与排检为缘，于是检字问题，愈形严重，急待解决。而研究创制，为唯一出路。故图书馆专家如杜定友先生创汉字排字法，沈祖荣、胡庆生二先生创十二种笔画检字法，迨王云五先生号码检字法出，继之以四角号码检字法，报纸宣传，杂志讨论，赠送小册，编卖字典，于是震动寰宇，新法纷起。其层出不穷之状况，有如雨后春笋^[9]。”1936 年李小缘又总结道：“近十年来，因图书馆事业发达，多数图书馆因排列卡片，恒感《康熙字典》部首法之困难，笔画排检之不易，诗韵法排列之过时，于是一般图书馆研究者，从而发明编制所谓索引法、排检法。其发明之方法，据蒋一前氏之统计，已有七十七种之多，此为二十二年年会论文。今三年中当续有突破八十种以上记录之希望^[16]。”

需求最能刺激创造，创造亦为满足需求。一时



间,各大图书馆所用检字法,形形色色,竞相涌现。燕京大学图书馆用的是“永字八法”,福建省立图书馆用的是陈鸿飞发明的“引得牌”,东方图书馆用的是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法”,岭南大学图书馆用的是陈德芸发明的检字法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非图书馆专业出身的学者,如林语堂,也据图书馆书目检索的需要来构思和创制检字新法^[17]。

以上史实表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他们为解决图书馆各类检索问题而创制检字新法,并进而掀起学术潮流,乃检字法运动兴起的主因。

2 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改革的主要活动

2.1 创立检字新法,关注学术动态

图书馆学人创制检字新法,有仿西法而“革命”者,有借传统而“改良”者。黄希声分汉字笔画为20种,“视与英文字母相同,即照英文按字母排列之法,逐笔比较笔画之种类,以定先后。谓英文之M、A、N三字母合而为MAN,犹汉字之一撇一捺之为‘人’”^[18]。后留美图书馆学者沈祖荣、胡庆生于1917年合编《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内中又分汉字笔画为12种,依序排列,亦如黄希声之法^[18]。陈德芸为岭南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乃发明一种汉字排检法,用横、直、点、撇、曲、捺、趯七种笔顺序列,以笔顺为字母,即以笔顺先后为字母排列先后”^[19],也是借鉴西法而成。蒋一前发明“汉字序次法”,“以笔画所成之小组织为单位,从四万余汉字中找出小组织五百余,归纳为十二大类”,“每类之中,有多至百余小组者,有少至六七小组者。同类之小组,以形排列”^[18],则明显是对传统部首排检法的继承和改良。继之杜定友的“形位检字法”,亦属借传统而“改良”者,影响颇大^[20]。此外,万国鼎、陈文等其他图书馆学人,也都自创新法,或“革命”或“改良”,各有傍依。尤值一论的是,洪业的“中国字度撷之法”,“盖揉取王云五之四角号码检字法,张凤之形数检字法,以及向来沿用之部首法而成”^[21],博取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法,殊难断定为“革命”者抑或“改良”者。

图书馆学人在自创新法的同时,还关注着整个检字法界的学术进展,适时地进行成果梳理和理论总结。万国鼎云,社会上每出一新法,同好则前来咨议讨论,1928年12月遂写成《各家新检字法述评》^[18],凡列新法40种。他将之分为5大类,并秉持客观态度对诸法优劣一一评述。此文一出,“四十

种检字法”之说即在社会上传开。1933年,蒋一前发表《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9]。该文以时间为序,先综合评述,后逐一列举。万国鼎、蒋一前二文皆持论精深,体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便利条件。其他如钱亚新、舒纪维、杜定友等,对当时流行的检字法也有精深的评述和理论探讨。

2.2 参与学术争鸣,探讨评判标准

在各检字法的发明和流传过程中,发明者常尊己卑人,“互相攻击得很厉害”。商务印书馆力挺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中华书局力推陈立夫的“五笔检字法”,全国各大小图书馆则多用“笔数排检法”^[20]。至于学者之间,更莫衷一是。方承谟认为“理想中最实用的检字法,实还没有产生,比较地能较四角检字法易学,能较汉字排列法易检的,要算陆衣言先生头尾号码检字法”^[15];陆殿扬认为陈立夫的“五笔检字法”最好^[22];杜定友则认为自己的“形位检字法”最符合汉字本身结构规律^[23]。本该理性、自由的学术争鸣最后竟夹杂着冷嘲热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各方论战的主要舞台,图书馆学人乃其中主角。兹略举数端如下:

关于部首法和号码法的争鸣。学界通常认为汉字检字法改革中的学术争鸣主要由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引发。王云五高调宣称“四角号码法”非但比“部首法”或“笔数法”容易,比西方的“字母排检法”也便捷得多^[20]。加之其以商务印书馆为奥援,大肆宣传,遂引起学界不满。杜定友、蒋一前、万国鼎、陈文等都对其进行了学术批评。实际上这只是众多争鸣中的一个论题。当时主张抛弃传统旧法而另立门户者,非独王云五一人。不过王云五“一定从每个字寻出四个部分,所以就提出‘四角’或‘头尾’各两笔”,“又因为‘号码’是十进位的”,于是就硬把汉字笔画分作10类^[20],这被认为是削足适履,“弄得中国字‘粉身碎骨’”^[24],其遂成众矢之的。杜定友说:“对于打倒部首之说,我也提倡最力,内疚滋深!按我国文字,首重形象,部首之制,虽病支难办,但混淆者,也不过十之一二。比如‘杜’是木字边,‘江’是三点水,毫无疑问也。何以因噎废食,把部首尽行打倒呢”^[25]?”因杜定友的“形位检字法”含有与王云五“四角号码法”互争高低的私怨,故其对王云五的批评或较过火。但的确“四角号码法”自发表以来,“赞成者和反对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而在检



验过此种方法的图书馆学者看来,该法是“排字法劣检字法优”^[26]。

关于音序法的争鸣。外国人编纂的汉语字典以音序排检,给中国学者以极大启发。林语堂仿此于1916年发表“新韵索引法”,却旋即引来批评之声。林语堂认为图书索引“一来都是平常字”,“二来字数没有字典多”,故以韵排检比较方便。他甚至“相信书目、人名索引非用此法不可”^[11]。图书馆学人却认为:该法据北京话韵母编制而成,他如粤、闽、浙之人难以适用;使用者需懂汉语音韵学上的开、齐、合、撮等知识,不甚方便;该法并不适合书目排检等等。蒋一前甚至认为“字音不可依据”,因为“字音之不固定,犹远胜于形体。古今异读,方言歧出,声之标准正难遽定。即退一步言,字音能固定矣,犹不能据以为序。盖汉字为单音字,同音者多至百余,无所准以为先后,且一字每有数音”^[12]。蒋一前道出了汉字检字法发明者从音着手的根本弊端,但断定“字音不可依据”又略显偏激。

关于汉字笔画、笔顺和结构的争鸣。汉字笔画繁多,种类难定,加上字形不断演变,至20世纪初,许多字仍无固定笔画数目和笔顺规矩^[20]。依据笔画创制检字法者,又多对汉字结构任意拆分,使得笔画的种类和数目言人人殊。“或采列举法,笔画种类多至二十左右,颇觉繁杂难忆,且每有似是而非者。或将曲折之笔剖开计算,或将不同笔画归纳为类^[12]。”对于笔顺,主要围绕陈立夫“五笔检字法”展开论争。陆殿扬认为“五笔检字法”依据汉字自身的规律,是当时“比较上最简便最合理的汉字排检法”^[22]。陈德芸则认为许多汉字的笔顺并不固定,其先后因人而异。万国鼎又认为:“同一笔画,同一顺序,每可结成多种不同之形体”,“若但恃逐笔比较其种类,则必比至许多笔,且因形体不同,易使迷目,致生错误。故必论其位置上之关系以别之”^[12]。故有关汉字笔画、笔顺的争鸣发展为对汉字结构的争鸣。又因各家对汉字构成的基本单元见解不同,所以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也不一样。如万国鼎认为汉字是由基本笔画通过相互间的离、接、交、连、逆5种关系构成;何公敢则将汉字分为单体和复体2类;张凤却将汉字理解为由点、线、面构成;杜定友主张在传统“部首”基础上分汉字结构为纵、横、斜、载、覆、角、方、整8种。其中,杜定友的观点影响较深,比如,“纵”也即今天所谓的汉字的“左右结构”,“横”也即

今天所谓的汉字的“上下结构”。但这8个种类之间的区分不甚明朗,所以也引起学界争议^[7]。

以上数端争鸣,追根溯源,是由汉字本身复杂的结构、多变的读音、不稳定的形体等因素引起的。蒋一前总结道:“新法何以若是之多,即因汉字之组织复杂,方面太多,自各有依据所致。或执字头,或掣字尾,或头尾并擒,或攀其角,或数其骨,或既数其骨,又复论其头,是以有各种字头、字尾、四角、面线等方法。其依据相同者,运用之手段又异。或用号码,或用符号,或计数目,或分部,或比较,或间杂参用,是以又有‘号码派’‘符号派’‘部首派’等方法。汉字本自左至右,自上至下者,但亦有自右起者,更有自下起者。是以又有‘齐右旁’‘齐左旁’‘齐下部’等方法。汉字分形音义,现代已无从义立法之笨伯。然而‘主声派’正不亚于‘主形派’也。是故今日为新法庞杂众多之时代^[9]。”

在争鸣过程中,检字法的焦点指向了其评判标准。于是图书馆学人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为学术交流平台,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探讨检字法的评判标准。

协会1929年召开第一次年会前,便邀请各检字法大家与会,如致信林语堂:“推先生为索引检字组委员”^[27]。一些媒体也开始造势,云本次年会要为各检字法名家提供公开讨论的平台,以统一图书馆检字问题。会上,提交或宣讲检字法论文的学者有张凤、万国鼎、何公敢、蒋一前、王鹤、钱亚新、毛坤、瞿重福、蒋家骧等,此外还有陈文讨论检字法问题的来信2封。一些未提交论文的业界知名学者,如王云五、杜定友等,也依约赴会。与会者凡49名^[28],囊括了当时该领域各路大家,可谓“百家争鸣”。鉴于检字问题与图书行业关系甚巨,又“渐为国人所重”^[12],社会上几十种新法高下难定等原因,经过激烈的讨论,李小缘、孔敏中、杜定友提议在协会下设“检字委员会”专司其事,后经与会者表决成立。检字委员会由沈祖荣任主席,万国鼎任书记,王云五、张凤、赵元任、蒋家骧为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因“四角号码法”备受非议,杜定友曾讽刺其让汉字“长角”乃一大“发明”^[29],但这并不妨碍他当选为检字委员会委员。且王云五、赵元任、张凤原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足见当时图书馆学界开放之风。本次年会在检字法学界最深远的影响是确定检字法研发和评判的3条标准:一曰“简易”,二曰“准确”,三



曰“便捷”^[30]。这是图书馆学人杜定友、张凤、陈文、万国鼎、蒋一前、沈祖荣等与其他与会专家磋商，根据图书馆业所需检字法实情得来，并很快被学界认可。如赵荣光发表“‘不’字检字法”时，就宣称“始终未离这三大标准”^[31]。3条标准的制定，对引领检字法研究朝健康方向发展，终结含沙射影的学术歪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虽然有关检字法的论战不时又起，但声势已无往昔，渐趋平静。

2.3 正名专业术语，批评抄袭之风

术语统一是学术规范的根本，名称混乱常伴随着改头换面的抄袭行为。因近代中国图书馆业起步较晚，许多专业术语来自西方，往往同名异译，而传统的相关名词又难以准确地概括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于是协会第一次年会上便有了“订定中国图书馆学术语案”^[32]。随着新法的不断涌现，检字法的新名词也层出不穷。诸如检字法、索引法、排检法、字根、笔画、笔顺、笔势、笔意等称谓，都是传统“小学”或目录学所没有的。到底什么是“检字法”，亟待专业人士正名。如林语堂将汉字排检与书目索引一概而论，还有学者将检字法与各个行业的专业索引，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商名索引等混为一谈。社会上对检字法的称谓更是五花八门，据1929年万国鼎统计，约有“排列法”“排字法”“排叠法”“序次法”“检字法”“索引法”六种，相互混用^[12]。鉴于此，钱亚新从专业角度区分了索引法、排字法、检字法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3]，至今犹广为学界援引。赵荣光的论述也很精彩，他说：“‘检字’是排字的目的，而‘排字’是‘检字’的手段”，“排字的工作是综合的，方法是归纳的；检字的工作是分析的，方法是演绎的”^[31]。万国鼎主张以“检字法”取代“排列法”“排检法”等称谓，以统一术语^[12]，“检字法”之称谓遂流行至今。万国鼎主张“检字法”实含“排字法”的观点，也广为学界接受。此外，图书馆学人还讨论了笔画、笔顺、笔势等概念以及汉字的点、线、面、角等结构新术语，同时也对任意拆分汉字和捏造新名词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同时，因检字法的发明具有很强的学术连贯性，所以传承与抄袭之间难以截然区分。1928年2月，何公敢发表“单体检字法”，万国鼎认为与自己的方法有颇多雷同，于是委婉地写道：“余固不敢谓何先生采取余意，至少其所见大体与余暗合。故此两法大同小异，利弊亦相似”^[18]。”但检字法界以杜撰新

名词抄袭他人之法的行径的确存在。杜定友严厉批评道：“凡是发明的人，总说自己的方法好，对于别人的方法，未能仔细研究，反而剥头削尾，稍稍改变一下，也就是一种发明”。如“四角号码法”其根本思路是“以号码代字”，“于是来了许多六角法、首尾法、头尾法、计数法，但是总逃不出‘以号码代字’的方式”，“只图剽窃，以抄袭为发明”^[24]。蒋一前讽刺道：“其间创思发明，自成一家者，犹可一说。其取巧抄袭之徒，则毫未下过苦功，彻底研究，辄就他人已有者，或加以改易，自以为改进派；或混合数种方法，自居为折中派；朝得一思，夕成一法，又焉得不蔚成今日之大观也”^[9]。”

2.4 将图书馆作为实践场所，将协会杂志作为宣传阵地

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发明的主要动机在于字典编纂和图书检排^[11]。万国鼎比较了字典与图书馆所需检字法的差异：“字典排比单字，问题较简，虽用附表、计数或算号码等间接手续，费时稍多，因所查只一字，究属有限。若在书目、索引等，则不便”；字典中前后两字易序，影响不大，“然在书目索引等，则必须任何二字绝对不能先后互易，盖书目或索引中各条，常有第一字相同者，有时多至数十百千余，若某字与第一字无所准以为先后，则检查时不知在此数十百条之前或后，其情形与字典悬殊矣”；字典为学习工具，费时稍多亦无妨，“书目、索引序列等则大都为成人所用，且为事忙者所用，迅速重于学习之难易”。因此，“书目、索引、序列等对于完善检字法之需要较殷，标准较高”，故检字法的标准“不可但以字典为对象，合于字典为止境”，而应以适用于图书馆的标准为标准^[12]。

因此，图书馆学人多将图书馆作为检字法实践的理想场所。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在东方图书馆试用，陈德芸的检字法在岭南大学试用^[19]。甚有检字法直接以某图书馆命名者，即由该图书馆的学人在实践中改造、综合他法而成。如“中央大学图书馆检字法”，“先依笔画之多寡为先后；笔数相同者，以起笔之形式分为先后”^[18]；“中央党务学校图书馆检字法”，“先依笔画之多寡为先后，笔数相同者，依陈立夫五笔检字法为先后”^[18]。此外，协会第一次年会通过议案：各图书馆应是各检字法检验的场所，各检字法发明者或出版机构亦应将新检字法印刷品寄交给图书馆。各图书馆应将最终试用情况报告给检



字委员会，以便汇总研究。1933年，协会第二次年会仍主张“将（检字）新法通知各图书馆，以便采用”^[34]，这表明将图书馆作为检字法的检验场所渐成学界共识。

甚有从图书馆适用的角度，来评判或宣扬各检字法者。舒纪维根据在图书馆的亲身体验，对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和杜定友的“形位检字法”进行比较，各论短长^[26]。万国鼎批评陈文“首尾面线检字法”时云：“惟排检一字，须兼用记号及数码，未免太烦，在字典尚无大碍，在排比书目索引等时，若须注明记号及数码，则异常不便矣”。又在评价“四角号码法”时曰：“王先生此法，已达相当便捷，尚非彻底办法，字典可以采用，在书目索引等，即感不便”^[18]。东方图书馆在宣传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时称：“此种检字法，只要能辨字之横撇点捺者，皆可依法检得所欲检之字，毫无困难。且可无须熟悉字典部目，诚为前此未有之创作，现在本馆之书名及著作人两种目录卡片，即试用此法，将来检取书籍者，定称便利也”^[35]。万国鼎在发表“汉字母笔排字法”时亦云：“编纂年余，稿凡七易，及大体粗具，施诸实验，觉其便于检查，不减西文。用敢公之于众，并求大雅之教益”^[18]。”其所谓“施诸实验”指该检字法在图书馆的“实验”。

最后，图书馆学人利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宣扬检字新法，进行学术交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发表的检字法相关文章可概为3类：其一，发表各类新法，如《形数检字法》《杜定友形位检字法大纲》等；其次，发表理论或商榷性文章，如《汉字排检问题》《汉字形位排检法修正商榷》等；其三，进行相关新闻报道，如《检字法研究之新闻》《检字新讯》等。《图书馆学季刊》也发表各类检字新法，如第一期发表林语堂的《图书索引之一新法》，但更注重对检字法理论探讨和成果综述，如《从索引法去谈排字法和检字法》《各家检字新法评述》《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等。

以上活动表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引领着汉字检字法改革的学术潮流。

3 种豆得瓜的历史影响

民国时期涌现出林林总总的检字法，孰优孰劣及其影响大小，可谓莫衷一是。当时发明者即就此争论不休，高下难定，至今仍在学界延续。从应用角

度来说，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至少有121种，而流传至今尚有生命力的检字法当属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3]。此言不虚，甚有学者认为“四角号码法”应该在当下普及^[36]。但也有学者认为，若没有王云五依靠自身地位对“四角号码法”过度宣传，洪业的“中国字度撷法”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当在“四角号码法”之上^[37]，而洪业当年也有类似观点^[38]。从学术传承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对部首法和笔形法的改进花费了较大的精力，而对汉字改革后四角号码法的相应改良却关注不够”^[39]。“改革派”的检字法“如今都基本烟消云散”，“改良派”的主张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检字法大讨论中掀起波澜^[2]。尤其是杜定友的“形位检字法”所引出的汉字切分、归部问题成为学术焦点，其影响力又在“四角号码法”之上。持公而论，经过历史检验，今天的检字法“机排”取代了“人排”，汉字的排序方法从单一的义序法、音序法、形序法、号码法，“发展到互相渗透，多元排序，综合使用的新阶段”。反观历史，“各种排序法是优点缺点并存，也是相对的。没有一种排序法是万能的，只能是相对的优点多一些，缺点少一些”^[40]。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立场，其结论殊难一致，因此笔者也无意遽定各家检字法孰优孰劣及其影响大小。

历史辩证法主张还原历史的真实背景，辩证地讨论历史事件。单从中国图书馆业与检字法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检字新法的创制，基本满足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汉语辞书的编纂，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汉字排检手段。无论是号码法、符号法，还是笔画法、音序法等，都颇具中国特色。但因民国时期社会多难，汉字尚未简化，语音尚未统一，图书馆学人创制检字新法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更没有达成统一检字法的最终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普通话推行，且简化后的汉字又有了定音、定形、定序等规定，于是汉字检字法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流行至今的部首法、笔画法、音序法、号码法等，又莫不吸取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字法方面的经验^[41]。虽然当下社会日益数字化，高效的搜索引擎便利了各类信息的检索，但纸质书籍并未像某些学者预期的那样被电子书压倒性地取代^[42]，汉字检字法在辞书编纂、图书编目及索引等方面仍有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字法



方面的成果仍有借鉴和利用价值。

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改革的深远影响不在检字法及图书馆业，而是在汉语史方面，可谓种豆得瓜。

3.1 解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

《说文》按部排检的方法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检字法中处于主流地位，是因为它将汉字的形、义关系一一对应。但汉字因形体不断演变，其形、义关系逐渐支离。所以明清时代的字书，在汉字排检方面“有的人着眼在字的源流”，“有的人着眼在检查方便”。比如“颖”字，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将其放在“页”部，主张“论其形不论其义”。《康熙字典》又将“颖”字放在“禾”部，因为《说文》云“颖，禾末也，从禾顷声”^[43]。但《康熙字典》的排检方法也非从一而终，“忽而主形，忽而主义”^[44]。这表明，明清时期，学人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固有认知已有动摇，但尚未完全突破《说文》故例。尔后两百余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康熙字典》原本错乱的检排体例。民初图书馆学人为图书排检便捷而创制检字新法，对汉字构字部件大胆拆分，对部首、笔画重新归类，并创造性地析出点、线、面、角等单位，则完全突破了人们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固有认知。

汉字大规模简化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但因简化后汉字的形、义关系愈加分离，所以无论简化字的倡导者还是接受者，都应首先具有开放的语言文字思想。图书馆学人创制检字新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禁锢人们的汉字形、义关系思想。

3.2 拓展了人们对汉字基本构成单位及结构的认知

《康熙字典》及以前的字书难脱《说文》窠臼，认为部首即汉字的基本组成单位。古人虽然也讲究笔画，但多是从部首的角度来理解汉字而非笔画^[22]。而图书馆学人在创制检字新法时，多认为笔画即是汉字的基本构成单位。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拼音文字所用检字法的影响，试图用有限的笔画来统领整个汉字系统，达到以简御繁的目的。尽管杜定友等对这种机械拆分汉字的做法不甚满意，但笔画毕竟是比部首更小的单位，这当是对汉字构成单位认知的一大超越。诸家检字法所确定的汉字笔画种类和数量虽然不一，但强调以笔画来分析汉字，意义重大。因为简化后汉字形、义关系进一步脱节，其普及和教学等多采用笔画拆分的方法。

又因为汉字同笔画和同笔顺者太多，仅据笔画

或笔顺难以泾渭分明，所以要提高检字法的排检精度，又须对更大一级的汉字组成单位进行研究。无论是广受批评的、被评价为“异想天开”的头、尾、角、面等法，还是在传统基础上改良的“部首法”，都展现出汉字复杂的面相，加强了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理解和认知。“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对汉字构字基本单位及结构系统的大讨论。

3.3 促进了汉字形体的规范化

汉字检字法宏观上可分为“从形”和“从音”两类^[1]。从形者首先需统一笔画、笔顺以及汉字结构形体，从音者则是建立在统一语音的前提下。蒋一前、杜定友等对音序法深入研究后，认为汉字同音字太多，即便在统一语音后，排检仍有困难。故音序法的不足又促使不少学者转而从形入手寻求新法。所以检字法运动的影响又重在从形者所需汉字笔画、笔顺及结构等规范化方面^①。

虽然各家在汉字笔画种类和数目方面主张不尽一致，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更是单笔与复笔混杂，但经过检字法实践和学界继续研究，不合理的笔画种类逐渐淘汰，冗余的笔画逐渐合并，如将“捺”与“点”归为一类，“横”与“提”亦归为一类。在笔顺方面，葛启扬研发“‘丙’字检字法”时，发现“各人写字，下笔不一定都同”，于是他分别在大学、中学、小学对当时起笔有争议的“小”“匕”“光”等50个汉字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发现这些字一般有2种起法，3种者“实是偶然中的偶然”，少之又少^[45]，于是便根据问卷结果来规定字的起笔顺序。赵荣光“对48个笔顺有疑义的汉字调查2680人”，以确定何种顺序乃时人常用^[31]。万国鼎则试图从理论上寻找汉字笔顺规律，他认为“笔顺问题向无陈规，论字之书如《法书要录》《书法正传》之类，绝少论及笔顺者，实际上往往因人而异，似是漫无标准，然细考之，亦有天然之规则可寻”。“笔顺大多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盖作字求其顺手便写，此人情所同也”，少数字从右至左，先中间后两边，也是为了方便书写的缘故^[46]。于是他根据这个规律，来确定其检字法的笔顺原则。在汉字的结构形态上，讨论并统一了类似“理”字左边的“王”最后一笔是“横”还是“提”，“户”字的起笔是“点”还是“横”，在相邻笔画间的关系上哪些是“接”、

① 作者目前尚未找到关键史证，证明检字法运动的从音者是否倒逼汉字语音的统一。



哪些是“离”等等。这些探讨无疑也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价值^①。

当时图书馆学人所持有的汉字检字法当简易、准确、便捷的思想，也促使他们不断地来统一汉字的笔画、笔顺和结构形态。

3.4 促进了汉字的简化

即便统一了汉字笔画、笔顺和形态结构，相关的检字法依然例外太多。每一新法要解决既有缺陷，就必须减少例外，从新的角度寻找弥补手段。如四角之不足，“用五角作标准”，“因为五角不合，就另想点画的方法，因为这也不合，于是又想出面线方法”^[24]。按照如此学术研究演化发展，发明检字新法最终从研究汉字形体结构走上了试图改变汉字形体结构的学术理路，于是有图书馆学人随后提出了汉字简化的主张。1929年万国鼎论道：“故欲求检字法之彻底解决，尚需改革汉字，且汉字难识难写，打字与印刷亦均不便，不独于检字法上发生困难也，实有亟谋改革之必要”。“改革须注意下列各点：（一）易识；（二）易写；（三）容易排检；（四）容易印刷及打字”。“改革之法有二：（一）改用简笔字以为过渡；（二）创造新字以垂永久。新字须以汉语为基本，并须力求符合现今汉字之性质”^[12]。万国鼎的观点可谓高瞻远瞩，新中国成立后力图改变汉字“难认、难读、难记、难写”状态的汉字简化^[47]，多暗合了他的主张。但图书馆学人中非独万国鼎主张汉字简化，协会第一次年会即通过了“上书政府当局，请求汉字简化”的提案。1935年杜定友说：“曩编《简字标准字表》以备图书编目写卡之用。该表所列简字，凡四百余字；合简体部首，恒逾千数。然个人所选，未敢视为定论，聊供同志之参考耳”^[48]。是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简体字324个，令图书编目采用。杜定友即据书目编排特点，结合他所创“形位检字法”，对其重新排列和进一步改造，以便在图书馆推行。这批简化字虽然很快废止，但其在图书馆的试用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奠定了实践基础。而这324个简化字中仍有213个保留至今^[49]。

杜定友在1934年还试图“创造新字以垂永久”。他将汉字部首与当时的注音字母相结合，创立一种左形右声的“新体形声字”。在阐述该字的好处之一时云：“我国字典，部首笔画，根据不定。检字索引，向无善法。以致检查字典，困难丛生。图书索引，无由编纂。其阻碍学术之参考，影响于文化甚大。兹

者部首有序，注音有次。用为索引，一检即得^[50]。”由此知其创立新字的动机不乏检字和图书索引的考量。杜定友还历数旧体汉字缺点：“单体单音”“艰僻难识”“六书”无据而形体多变等，致使教育难以普及，实与“科学时代”不符。故“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简便之文字不可”^[51]。当然，“新体形声字”主要还是针对汉字“笔画错综、字形不一”“笔画丛多、繁简不一”等弊端^[50]，是一种仿拼音文字而自创的特殊简化字。但正如杜定友所云，他创制检字法，有一个从效仿西法而“革命”到回归传统而“改良”的转变过程，其探究汉字简化的过程也与此相似，在提出“新体形声字”后，便深入开展“字根研究”。“字根”是对传统汉字部首的改良和发展。1961年杜定友发文称：掌握“字根”就可以在检字方面驾驭全部汉字；利用“字根”是汉字简化的重要办法^[52]。而其“字根研究”的确直接惠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6]。

4 结语

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整体视角探究汉字检字法改革，却看到种豆得瓜的学术景象。近代中国图书馆业及其检字法发展的史实，也表明汉字的规范化、简化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为何能在检字法方面作出成绩，并对现代汉字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亦值深省。或许他们不囿于图书馆业本身，勇于打破学术畛域，用图书馆学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检字法问题，乃其根本原因。正如钱亚新20世纪80年代写道：“现在来打个比喻：汉字的笔画好比图书分类表中的一个大类；每个同笔画的字，好比同类图书的一种书。当我们处理同类的图书要求前后有序，必然还要设计一套书号，因此要求同笔画各字前后有序”。“从目前字典或辞书的编制上，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在图书馆的字顺目录中，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这两个方面，现在已经有显著的倾向，大有异曲同工之妙”^[53]。

但凡事过犹不及，这批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检字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姑不论其对西法的盲目套用，发明新法时抄袭和借鉴不分，学术批评

① 联系到2009年的“汉字整形”事件，或可说汉字至今尚未彻底完成形体规范化。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创制检字法过程中，无意间成了“汉字整形”的先驱。



上含沙射影等,单从其在汉语史上的负面影响而言,也足警戒后学。尽管这批图书馆学人都具有较好的“小学”基础,但他们多不以汉语言文字学为业。不少发明者不顾汉字的基本字理,对汉字结构任意拆分,的确无异于削足适履,“因噎废食”^[25]。可以想见,人们使用这样的检字法,久之便会固化对汉字结构的错误认知,从而滋长社会上错误的拆字歪风。故杜定友对他们的批评也不无道理。但杜定友所创造的“新体形声字”,因过于求新求简而乏社会基础,所以也并未流行,他在“字根研究”中的一些简化主张也在“二简”汉字中证明过于冒进。这些教训莫不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 1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98.
- 2 陈燕.国语运动与汉字检字法改革[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6):18-23.
- 3 平保兴.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史论[J].辞书研究,2014(5):60-65.
- 4 邓咏秋.漫议四角号码检字法[J].图书馆杂志,1999(5):3-5.
- 5 李彭元.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历史贡献[J].图书馆论坛,2018,38(12):85-95.
- 6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96-115.
- 7 张望自.杜定友先生对检字法研究的路向[J].图书馆学研究,1984(6):117-122,151.
- 8 吴祚年.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界的商榷问题[J].图书馆,2012(5):28-32.
- 9 蒋一前.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J].图书馆学季刊,1933,7(4):76-98.
- 10 张凤.吓!打倒康熙字典才有绪了[N].民国日报·觉悟,1928-10-27(3).
- 11 林语堂.图书索引之一新法[J].语丝,1926,76(1):155-161.
- 12 万国鼎.汉字排检问题[J].图书馆学季刊,1929,3(1-2):120-133.
- 13 万国鼎.请中央研究院研究改革汉字案[R]//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228.
- 14 万国鼎.汉字字母笔排列法附表[J].东方杂志,1926,23(2):75-90.
- 15 方承谟.最实用的图书分类法与检字法(二续)[J].中国图书馆声,1931(4):25.
- 16 李小缘.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J].图书馆学季刊,1936,10(4):507-549.
- 17 刘复,袁同礼.通讯:关于林语堂图书索引新法之通讯二则[J].图书馆学季刊,1926,1(2):371-372.
- 18 万国鼎.各家新检字法述评(附表)[J].图书馆学季刊,1928,2(4):46-79.
- 19 文献消息.陈顾问德芸逝世[J].广东文献通讯,1948(1):24.
- 20 沈有乾.“汉字排检问题”谈话[J].书人,1937,1(1):37-40.
- 21 豪楚.书报提要引得说(洪业著)[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6):153-156.
- 22 陆殿扬.比较上最简便最合理的汉字排检法:陈立夫氏的五笔检字法[J].教与学,1937,2(10):1-4.
- 23 杜定友.中国检字问题(附表)[J].教育建设(上海),1931(4):31-35.
- 24 杜定友.中国检字法评略[G]//杜定友.中国检字问题.上海:中华

- 书局,1931:1-11.
- 25 杜定友.我与圃[J].图书馆学季刊,1932,6(3):173-174.
- 26 舒纪维.汉字排检问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7(4):2-3.
- 27 林语堂先生:北平北海公园中华图书馆协会又有信致先生[N].民国日报·觉悟,1929-1-16(3).
- 28 研究汉字排列法并厘定标准[N].民国日报,1929-2-1(4).
- 29 杜定友.读者信箱:述汉字形位排检法[J].中国新书月报,1931,1(9):59-60.
- 30 中华图书馆协会.决议案[R]//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60.
- 31 赵荣光.前缀“不”字排检法”自序[J].培正中学图书馆馆刊,1936,3(1):15-23.
- 32 李继先,金敏甫,李小缘.订定中国图书馆学术语案[R]//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163-165.
- 33 钱亚新.从索引法去谈谈排字法和检字法[J].图书馆学季刊,1929,3(1-2):134-141.
- 34 陈长伟.请协会根据上次会议从速规定分类编目标题及排字法标准案(大会合并决议通过)[R]//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33:77.
- 35 东方图书馆.试用四角号码检字法[J].励志,1926(1):106.
- 36 乔永.四角号码检字法应该普及——由《辞源》说开去[J].出版科学,2015,23(3):8-13.
- 37 郑康邮.洪业与引得编纂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32-33.
- 38 洪业.引得说[G]//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 杨联陞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2.
- 39 徐祖友.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J].辞书研究,1990(6):128-134.
- 40 纪长海.汉字主要排序法比较研究[J].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6-7.
- 41 陈燕.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兴起及对后世的影响[C]//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文字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第七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69-75.
- 42 Wang L, Zhang J L. The paper books and the electronic books complement and develop in parallel in the digital 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Engineering,2017,2(3):22-26.
- 43 白淦洲.略谈字典部首流变——兼答周茂君(未完)[J].国语周刊(合订本第一册),1931,1(18):39.
- 44 王文莱.检字法:图书馆利用法之八[J].图书展望,1936,1(10):38-42.
- 45 葛启扬.“丙”字检字法之修正[J].中国出版月刊,1933,2(1):14-16.
- 46 万国鼎.修正汉字字母笔排列法大纲[J].图书馆学季刊,1926,1(2):136-141.
- 47 曹夫昂.文字改革工作问答[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9.
- 48 杜定友.图书馆用简体字表[J].工读周刊,1935,1(1):4-6.
- 49 沈克成,沈迦.汉字简化说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178.
- 50 杜定友.中国新体形声字母商榷(续完)[J].新中华,1934,2(4):47-52.
- 51 杜定友.中国新体形声字母商榷[J].新中华,1934,2(3):55-58.
- 52 杜定友.字根研究[J].文字改革,1961(2):33-35.
- 53 钱亚新.试论汉字笔画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J].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3(27):67-76.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收稿日期:2020年9月28日

修回日期:2020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王波,支娟)



Their Reform of Chinese-character Retrieval Method

Chen Yongming Li Yujie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me library scholars were dedicated to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 retrieval methods and theory research because the current ones could not meet the nee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business. And soon they became the backbones in this field. These scholars, with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as their communicating platform, and libraries as the places where they put new retrieval methods into practice, took actively part in debating on academic issues and led the trend of reforming Chinese-Character retrieval methods by criticizing plagiarize behaviors, rectifying terminologies and explor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Havi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Character retrieval method's reform, they even liberated people's captive minds from cur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creased their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it and structure, and promot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ose values and influences wer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of library business and the retrieval methods themselves. By breaking the academic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s, these scholar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companions today. However, their actions of deconstruc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rbitrarily and creating new ones hastily should be criticized.

Keywords: Library Scholars; Retrieval Methods;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接第 92 页)

Emotional Healing Picture Book Problem Solving Bibliogra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Reading Therapy in School Libraries

Ai Yuqing Chen J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focused reading” “categorized reading” and “reading therap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motional healing effects of picture books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It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From Perplexity to Firm: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otional Healing Picture Book Problem Solving Bibliography* and *From Depression to Calmness: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Healing Picture Book Problem Solving Bibliography* compiled by Professor Chen Shumei, explains the targeted effects of the two books on the emotional healing of student groups,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of reading therapy in school libraries.

Keywords: Reading Therapy; School Libraries; Emotional Healing Picture Book; Problem Solving Bibliography; Chen Shumei